



梁启超



徐刚◎著

烂漫饮冰子
梁启超传

作家出版社

烂漫饮冰子

梁启超传

徐 刚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 / 徐刚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1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ISBN 978-7-5063-7139-1

I. ①烂… II. ①徐…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 传记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843 号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

作 者：徐 刚

责任编辑：史佳丽

书籍设计：韩湛宁

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440 千

印 张：31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39-1

定 价：43.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组委会名单

主任：李 冰

委员：何建明 葛笑政

编委会名单

主任：何建明

委员：何西来 李炳银 张 陵 张水舟 黄宾堂

文史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王曾瑜 孙 郁 刘彦君 李 浩 何西来 郑欣淼
陶文鹏 党圣元 袁行霈 郭启宏 黄留珠 董乃斌

文学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白 烨 田珍颖 刘 茵 张 陵 张水舟 李炳银
贺绍俊 黄宾堂 程步涛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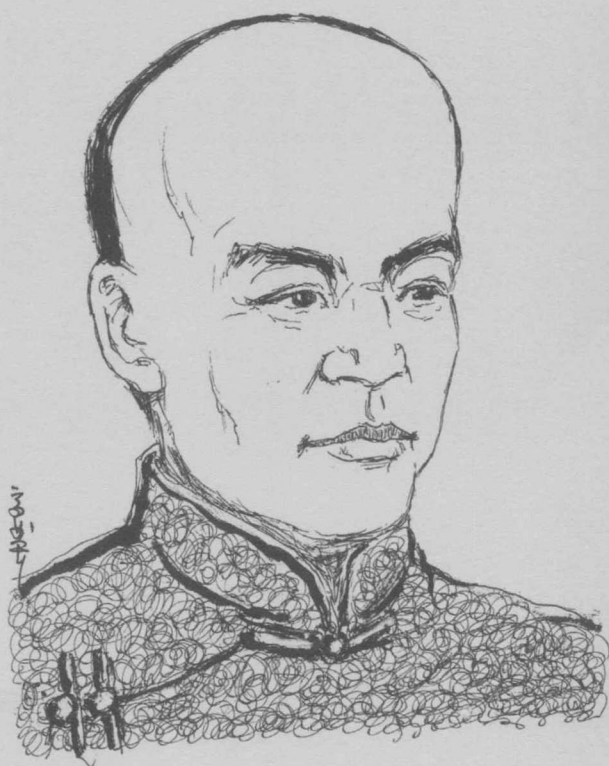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梁启超

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

——梁启超，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清议报》25册

是年（一九〇一年）先生始号饮冰子。

——《梁启超年谱长编》175页

目 录

001	引子 / 一代宗师
011	第一章 / 神童初出
023	第二章 / 万木草堂
036	第三章 / 也有风云也有情
057	第四章 / 呼风唤雨
074	第五章 / “去留肝胆两昆仑”
107	第六章 / 天以任公为木铎
137	第七章 / 因为他们，干柴始能燃出火光
170	第八章 / “私有制，乃一切文明之源”
189	第九章 / 宪政波澜
211	第十章 / 归去来兮
235	第十一章 / 身为党魁
257	第十二章 / 再造辉煌
282	第十三章 / 护国双帅
305	第十四章 / 沉浮依旧且远游
340	第十五章 / 爱先生与美先生
369	第十六章 /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382 第十七章 / 情圣梁启超

421 第十八章 / 大块文章

441 第十九章 / 呼啸清华

467 尾声 / 河岳日星

477 附录 / 梁启超大事年表

485 跋 / 灿烂庄严

引子

一代宗师

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〇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

〇〇六年重修，二〇一〇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

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梁启超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梁启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为：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方能不惑”；所谓“仁者不忧”，“仁”字是说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人，因何？梁启超释义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然而何以因此无忧？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正因永不圆满才有永远的创造和新生。“‘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

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不仅不忧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的写照。“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既不惑且不忧，又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是次讲演之末，几乎是大声疾呼了：“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民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全国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这些人当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呀？”梁启超情不可抑，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也。

梁启超是现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热诚拥护者、传播者，又是科学万能、科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五四运动之后，舶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当时国中不少人认为，有了科学就什么都好了，是有科学与玄学的丁、张论战。梁启超认为“不能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倘以理智涵括全部人类生活那就错了。所不能包括者为何？任公说：“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梁启超

并且以“爱先生”、“美先生”称之，又谓：“‘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正是“情育”、“意育”的化身。有之，得大义凛然；无之，生暴戾凶残；有之，为清廉诚信；无之，则腐败卖国。任公发明的“爱先生”、“美先生”，衡量时下，其“新意义”不若惊雷闪电乎？

泰戈尔说过，“我们不能借贷历史”，中国人则厚今忘古，善忘、健忘历史。梁启超很早便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健忘”的特症，一是在反袁战争结束后《五年之教训》的结句：“呜呼！毋忘！毋忘！呜呼！吾其如此健忘之民呵！”另一处稍晚载一九一五年七月《大中华》的《复古思潮平议》中，“甚矣！国人之善忘也”。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带有“史性”的写作贯于毕生，尤其是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最后十年，不仅几乎日日讲史，而且反复地讲历史研究法。任公何忧？忧当时人、后来人以历史为敝屣，忘犹过之也。所以梁启超一再呼告，像传道人之荒漠呼告一样：“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史学到底具有何种意义？何种魔力？任公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实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中，因为得着“明镜”，使他成了最无情的自我解剖、自我讨伐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论自己：“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者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又：“启超务广而荒，……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鹵莽疏阔手段，不能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梁启超自比陈胜，让他当时的一班做文章的朋友很是吃惊。任公有自谦，但也极自信且坦坦荡荡地说：“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之规模。”国人期

望之重，任公又自许、自励、自叹：“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上不能不谓一大之损失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其实正是在思想界造出一大境界的开始，《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后，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气象宏阔、缜密精湛的鸿篇大著，架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开国规模”，称之为先驱者、缔造者，不为过也。

社会乃至文化界一个不甚明了的问题是：文化有先进与落后吗？学问也以进化为法则吗？年轻时自言拥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梁启超，由上世纪二十年代始，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此论之对立面，自此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堪称世人如何审视当下与历史文化的宝典。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梁启超认为：“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言及文化的进化，任公有一系列发问，且摘数问：“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拜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这些话都从哪里说起？”在《戴东原哲学》中，梁启超谓：“有人说，依进化法则，二千年前人的学问，应该不及二千年后人……我说，此话不然。我们虽不敢说今人必不及古人，也不敢说古人必不及今人。不含时代性学说，尽可以几千年前的人发明了，几千年后的人无以易之。”任公认为：“凡学说有含时代性的，有不含时代性的。例如君主政治好么？议会政治好么？苏维埃政治好么？这是含时代性的；‘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原理，这是不含时代性的。井田好么？共产好么？几尔特好么？这是含时代性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理，这是不含时代性的。含时代性的学说，要估量它的时代价值；不含时代性学说，是不必且不该用时代去估量呢。”戴东原治孔孟之学，写《孟子字义疏证》，“自成一家言”，“以识字为手段而别有‘闻道’的目的在其后”，如戴东原自己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